

西方與蘇俄的外交政策

我們如果想明瞭蘇俄外交政策的根本性質，就須從一件明顯的事實出發，蘇俄同時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帝國和一個世界革命的極權主義運動的老家。我們不要忘了她是一個帝國。一九五九年調查統計指出，在二〇八、八二六、六五〇的全部人口中間，俄國人佔一四、五八八、〇〇〇人。此外再加上蘇俄統治下的東歐與中國人民九千六百萬。我們幾乎可以說，在三億蘇俄帝國的臣民中祇有一億一千五百萬俄國人。這個帝國自然也有她的通常戰略與經濟的利益，正如其他任何大國那樣。好些問題同舊日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帝國相類似。大家祇須一想波蘭、黑海海峽、伊朗、韓國、以及我們的東北，就容易明白這一點關係。這也就證明地理的基本因素還是存在，俄國在這個地球上依舊據有同樣的地理位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俄國力較弱，她的政策所具有的共產主義的立場比較受人注意，雖然不見得像今天那樣知道得透澈；現在因為世界已經變成兩大集團對峙的局面，倒是把這一點遮蔽了。我認為這是很不幸的。

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見解。共產黨相信，由莫斯科俄共中央委員會所確定的馬列主義，就是人類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全部解釋。人類社會不能避免的定律是，所有國家都得經由社會主義到

達共產主義，而且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共產黨相信這個歷史的發展程序，並且努力促其實現。一個共產主義者絕對認為他的目的會得到最後勝利，他要使用所有力量達成這個任務。

在蘇維埃政權的頭幾年，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行比較明顯，蘇俄外交當局以此為絕無疑問的鵠的。到了一九二五年以後，史達林勢力的興起，使世界革命的號召暫時減退，一方面因為一般國際情勢不利，另一方面，史達林自己在黨內為着鞏固他個人的領導地位，竭力整肅異己份子，最後還加上農業集體化的艱巨工作。可是世界革命的目的始終沒有放棄過。史達林總是主張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要使最強大的工業國家裏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樣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的包圍勢力。

第二次大戰前夕，一個新的階段開始。那時蘇俄的經濟建設已經有了相當成就，史達林認為俄國所達成的就是社會主義。在一九三六年的憲法裏他說明這一點。如果社會主義就是蘇維埃制度，那末社會革命就祇能採用蘇俄藍圖所設計的政權。在一九三六年，這還祇是理論，但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八年間，這個原則就在蘇俄軍隊所已佔領的八個東歐國家裏最現實地施行了。

可是史達林死去已有八年之久。這個理論是否已被改變？

最權威性的聲明當然要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莫斯科宣言，這是由歐亞兩洲十二個共產國家的代表所簽定的。其中有一段這樣說：「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建立係由某些基本定律所確定，這些定律可以應用於所有從事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這些定律真是無往不適，尤其得和各種不同的民族歷史的特徵與傳統相輔以行」。

這些定律中首先就是：

「勞動大眾應受以馬列主義共產黨為其核心的工人階級的指揮，這樣發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並且建立一種無產階級的專政」。

在一九五五—五六六年蘇俄與南斯拉夫妥協的時候，雙方都會談起到達社會主義的途徑。但在匈牙利革命的時期，赫魯曉夫却把一個工人階級所擁護的社會主義政權，殘暴地壓制下去了。一九五八年春天，南斯拉夫共產黨同盟的綱領草案引起顯著糾紛。南斯拉夫認為，要達成社會主義也可能不必經過革命，社會主義的奮鬥不一定由馬列主義的黨派領導。他們也許不見得完全以歐洲在社會民主黨為例，他們可能想到亞非各國的社會主義黨，例如緬甸宇努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但蘇俄的宣傳絕對不讓步。社會主義的奮鬥必須由馬列主義黨派所領導，並且必須經過革命。可是他們提出暴力的革命與「和平的」革命的區別來。所謂暴力的革命就是要把共產黨的敵人用武力推翻，然後用國家權力壓制他們。在第二種情形下敵人不必要經過公開的暴力鬥爭就會讓步，那末共產黨就「和平地」取得政權，實力祇用來壓制已經屈服的份子。米高揚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第廿屆俄共代表大會清楚地指出，當時他把捷克與東德當做經由「議會的途徑達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例子。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革命係由馬列主義黨派所造成的革命，依照莫斯科所認定的原則與策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許是暴力的——

在那種情形下暴力用於奪取政權之前與以後，這個革命也可能是「和平的」，那就是暴力祇用在奪取政權之後。

一九五八年，當赫魯曉夫已經絕對控制蘇俄政權的時候，俄共理論家把這種觀點明白表示過。赫魯曉夫已否改變這種觀點？他的地位由於他能控制黨的組織所造成。在史達林晚年，黨是他的權力的一種工具，其他工具包括警察、軍隊、以及工業機構。今天，黨仍舊是權力的最重要武器，好像列寧時代那樣。黨的重要官員與宣傳家要比列寧時代以來任何時期，都擁有更大聲威與權勢。因此，外交政策也要比史達林時代更受黨與主義的影響，不會減少。

並且赫魯曉夫為何要放棄共產黨的信念呢？他和蘇俄黨國要人都看到這一層，共產主義的理論對於實際行動確係非常有用的指南。在所謂共產主義的感召下，蘇俄的政治領袖把他們的國家弄成異常強大。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宣言對世界政治的情勢有以下的敘述。它把世界「和平勢力」分成六項。那就是：「以蘇俄為首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無敵陣營；亞非愛好和平的國家採取反帝國主義的立場，並與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形成一個廣闊的和平地區；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中堅份子——共產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各國人民羣衆的和平運動；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民衆繼續反抗一次新戰爭的計劃」。蘇俄政府堅信，她能動員這些勢力，達成「社會主義」，也就是蘇俄統治的世界性的勝利。赫魯曉夫從來不曾表示他不同意這種看法，要知道他是黨的第一書記兼蘇俄部長會議的主席，是黨政一元領導。我覺得，我們應該對他的信念與政策加以慎重考慮。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發表的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的聲明，充分說明赫魯曉夫和他所領導的蘇俄外交政策的真相，那就是要衡量國際現勢，運用新的政略戰略，破壞自由世界的陣營，達成社會主

義世界革命勝利的任務。目的始終沒有改變。現在把它對於共產國家相互關係的準則摘錄下來：

(一)「蘇俄首先在歷史上爲人類鋪設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她是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自由、民族獨立與社會進步鬥爭中最光輝的榜樣和最大的堡壘。

(二)「中國人民革命」給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陣地以毀滅性的打擊，並對世界均勢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絕大變化。它給民族解放運動新的有力的推動。

(三)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準則就是要嚴守馬列主義的原則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原則。

(四)社會主義各國根據每一國家的歷史特徵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利益，運用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進行實際工作。

(五)共產黨不宜忽視民族特性，不應呆板地抄襲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策略。

(六)民族主義與地方性的表現並不隨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而消失。各國共產黨必須執行馬列主義的國際主義政策，以國際主義與愛國精神相結合，這樣教育勞動大衆，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侵略主義。

這次會議並且重申各國共產黨於一九五七年的宣言與「和平宣言」，認爲這兩個文件仍係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鬥旗幟與行動指南。我們如果把這次聲明仔細研究，就會察覺今後國際共產黨仍會採用一九五七年會議所決定的策略。

爲了進行這些策略——不論用武力或其他的滲透顛覆的方法，把蘇維埃式的政權強迫施行於所有國家——這就使蘇俄的統治者和非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經常處於戰爭狀態之中。這和國際間的傳統關係完全不同。英法兩國曾經有過幾世紀的敵對狀態，因爲她們互

相爭奪歐洲地區或海外殖民地的勢力，如比利時荷蘭或北美，不是因爲英國人存心想毀滅法國，或法國人有意毀滅英國。蘇俄的領袖們所關心的是共產黨的任務，那就是要實現他們所認爲不能避免的歷史的發展的定律，必須打倒資本主義。他們攻擊的目標不是西方所進行，或所需要的，而是他們本身，換句話說，毀滅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我已經提到戰爭狀態，這裏的意義很廣泛。蘇俄目的是毀滅他們所選擇的敵人，並且他們的努力是有系統與永久的。各種各樣的方法都可以採用，傳統觀念的戰爭不過祇其一端而已。方法包括外交、宣傳、貿易與經濟援助、顛覆、游擊戰、衛星國家或「志願軍」的公開衝突，蘇俄軍隊運用普通武器，或熱核子戰爭。鬥爭方法的選擇與混合運用須視臨時或實際情況決定。例如，西方時常發生的：「我們究竟應該採用軍事或經濟的武器？」那種問題對於蘇俄評論家就毫無意義。蘇俄政策的執行經常顧到政治、經濟、與軍事各方面的力量與運用。

蘇俄對於熱戰的態度是冷酷的、現實的。他們連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樣對於戰爭的浪漫情緒都不具有。他們絲毫沒有和平主義的痕跡。他們的軍事理論包括能够發動任何戰爭，不論運用普通武器、小型原子武器，或全盤熱核子戰爭。直到現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實力阻止了蘇俄的直接軍事行動。在經濟與政治範圍，他們從一九四五年以來要比西方更爲成功。如果西方列強現在決定在亞、非與拉丁美洲從事大規模經濟與軍事競爭，這也許能够挽回劣勢；但另一方面，西方絕對不能減削軍事預算。他們必須不顧任何代價去迎擊這個敵人，否則就會一再遭遇挫敗。

蘇俄最近幾年來曾經有過很大變遷。我可以簡單地舉出比較重要的五點。第一、祕密警察要比史達林時代的權力略見減低了，

並且他們也比較謹慎地使用他們的權力了。蘇俄人民至少在外表上不再這樣恐懼特務了，並且他們可以和外國人談話。可是，秘密警察機構整個兒在那裏，政府當局覺得如有需要，隨時可以應用。第二、工人與農民的所得稍有增加，消費品也有增加。可是，重工業與軍事生產還是優先。蘇俄的經濟政策並非由消費者，而是由黨的領袖來決定。第三、武裝部隊減少。但軍隊人數，尤其是陸軍，要比西方國家多得多，實際作戰部隊和全部人數的比率也要高。第四、經理或工業技術人員在蘇俄社會的地位漸形重要。就在行政部門的重要職位，好些人員要看他們的專業訓練，不以主義或黨的資歷作為決定職位的唯一重要條件。思想主義與實際知識的衝突甚至在黨的組織裏都發生。一般青年對思想訓練大都持冷漠態度。像美國社會那樣具有事業組織能力的年青幹材開始在蘇俄境內產生。有些知識青年，在一九六〇年波蘭、匈牙利抗暴運動發生後，表現批評精神，他們不願拘泥於政治與經濟的教條。

所有這些趨勢沒有疑問存在，並且對於將來很有影響。可是我們不能把將來和現在混合在一起。蘇俄並不是由消費者、企業人材，或有情感的年青學生統治，而是由赫魯曉夫所領導的俄共中央委員會決定一切。

在美國麥加錫時代痛罵俄國人野蠻險詐的作風證明過於偏激以後，大家就認為蘇俄政府的敵視心理也不確實。這是民主國家最大的錯誤，一個敵對國家的人民不一定都是壞人，表面和善慎重的民族難道不能蓄意作破壞的行動麼？幾世紀以來俄國人民也還是聰明樸素的，但俄共早就認為自由世界是應該被征服的敵人。遠在麥加錫參議員攻擊之前，並在他死了以後，蘇俄仇視的態度迄未變更。麥加錫雖然過於主觀，但他所引起的毫無批評精神的反擊，影響更壞。事實上，今天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國，盛行一種可以說「反反共

主義」，其錯誤實較麥加錫主義的矯妄過正為尤甚。今天任何人指出蘇俄政治制度是極權政治，或分析俄共如何獲得政權，以及他們如何對外進行侵略政策等等，那就會遭到一種「職業的反共」的諷刺，並把他的論斷絲毫不加考慮地當做「冷戰的宣傳」。西方這種輿論傾向就被共黨充分利用。

現時蘇俄政策對於西方的主要危險究竟是什麼？我看來有四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蘇俄科學與工業的發展，會使蘇俄政府相信，他們能夠摧毀大西洋盟國的報復力量。如果這種情形發生，那就好像在英國方面已經不斷討論過的那樣，不出乎完全毀滅，就得向蘇俄統治者投降的途徑。由於這種失敗主義心理，所以就產生所謂對於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還是要靠為雙方所能接受的核子裁軍計劃。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列強裁軍會議的歷史，却證明要獲得真正的裁軍，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危險是蘇俄普通軍事實力的優越。這使蘇俄或她的衛星國家隨時可以衝破雙方邊界，有所行動，因而迫使西方國家不能不採取核子戰爭。這裏我想提出一點：蘇俄的優勢並非客觀事實，而是西方政府與選舉人的政治決定所造成的。蘇俄有二億一千萬人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將近四億人民。東歐國家的一億人口對於蘇俄集團的軍事價值很有疑問。西方祇要有決心，就有能力勝過蘇俄的普通軍隊實力。

第三個與第四個危險性我得敘說詳細一些。這兩點我名之為「包圍策略」與「精神分化」。包圍形勢的形成係蘇俄外交政策的重耍一環，他們盡量利用挑撥西方與亞非國家的衝突情勢，挑撥離間，使亞非人民最後弄到他們領導之下，這樣改變世界政治與經濟勢力的均衡，使西方最後除了無條件投降，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蘇俄

也在不斷利用西方輿論的傾向，造成在外交政策上對蘇俄有利的情勢，這種傾向一部份雖非由蘇俄政策所製造，結果却同樣要達到使西方屈服在蘇俄權勢之下，無異在國際政治範圍內進行「和平革命」工作，這就成爲直接的、不能避免的影響。

我想用三個比較受人注意的問題來說明這兩點——非洲民族主義，伊朗與德國。

非洲的大問題不在非洲各民族能否脫離西方殖民地勢力，自成獨立國家，那是已成定局，雖然有南非和羅德西亞所發生的慘劇。現在我們也不能過問非洲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得勢，究竟能否促進人類自由與文明。關鍵是在獨立以後，仍能對西方國家維持良好關係與否，還是就此形成深刻仇恨，至對白人具有一種熾熱的侮辱與報復心理，以至有利於西方的敵人？第二點值得注意是，這些獨立國家能否保持她們的獨立，還是立即被引誘，或被迫加入共產國家的勢力範圍？蘇俄對於亞非地區的政策完全具有這種目的。蘇俄統治者化了大量金錢與人力，在非洲進行滲透，並且不顧艱難困苦，實際執行，這使自由世界的專家們相形見拙。最近英國史家陶恩培號召派往非洲的美國青年，和當地人民共同生活，就是這個用意。

伊朗在今天的國際政治局勢中不大受人注意，至少我們可以說，西方輿論很少提起。中部公約的存在使蘇俄在地理上不能直接和阿拉伯國家接觸。這就嚴格限制蘇俄在伊拉克與埃及的影響。從蘇俄的立場來說，埃及是非洲的鎖鑰，伊朗是通往埃及的要隘。伊朗在中部公約三個回教國家中力量最薄弱。城市與鄉間貧富懸殊，目前雖在實施社會改革，但這不是幾年之內能够見效的。如果革命發生，即使不是蘇俄主使，蘇俄也會立即加以利用。在這個幅員廣闊

西方與蘇俄的外交政策

、交通阻塞的國家裏，首都一旦革命爆發，各省就會引起內爭。伊朗對於西方在中東的防禦與蘇俄對非洲的滲透具有這樣重大的戰略價值，各種方式的危機可能因此產生。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局勢。西方輿論似不甚注意這個問題，他們有時且對伊朗加以猛烈批評，對蘇俄侵略的實際目標却絲毫不曾有所警覺。他們對伊朗王室的指責祇能引起蘇俄的冒險企圖。

蘇俄政策對於德國的目的那真是太清楚了。這是要把德國在烏布里希（Ulbricht）政權下統一起來。一個極權政治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這是一個爲東德人民所痛恨的制度，但由蘇俄完全支持。統一必須根據東德與西德兩個政府的平等地位，好像一種聯邦制度那樣。一個強迫施行於四分之一德國人民極權政府，和一個由四分之三德國人民所自由選舉的政府，平均分配聯合政府重要職位。共產黨在中央擁有權力和重要地位，並且不讓民主黨派在地方上發生，那末他們就容易滲透，能把整個德國像過去捷克那樣滲透和赤化，並且造成同樣的結果。

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可是不見得一時就能實現。最近要想做到的是：要使烏布里希政權在國際上有地位，限制西柏林的自由，破壞德國人民對西方聯盟的信心。關於柏林問題這裏不能詳細討論。但蘇俄政策我想有三個目的：在經濟上使西柏林和西德脫離關係，在西柏林創造一種機構干涉他們的言論自由，最後，並使柏林人民相信西方會放棄他們。事實上，他們的目的是要使柏林人民精神上遭受挫折，結果使全體德國人民趨於分化，這些具有破壞性的企圖盟國人士必須予以密切注意。

蘇俄要想分化各國外交政策的主張並不限於柏林或德國。祇要細察英國目前的輿論，機會實在非常對他們有利。英國方面的精神低潮要比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時期，更加令人可悲。我們時常在「標準晚報」與「新政治家」雜誌讀到指責艾德諾的文章，說他是和平的障礙，出之於同樣語氣和筆調，這使人難以解釋。在慕尼黑會議前幾個月至少還有不同意見發表。今天一大部份英國報紙認為西德由具社主義色彩的人統治，東德卻是一個民主國家，由進步的人道主義者統治。一個英國主教可以寫信給西德駐倫敦的大使，抗議德國的人民示威運動，當東德逃出來的難民反對奧德—納塞河(Oder-Neisse)界線，認為不能接受的時候，英國報界說這是西德政府有意侵佔波蘭的表示，而奧德—納塞河界線已經劃定，不會改變。但東普魯士人被迫離開家鄉，拋棄一切所有，心中痛苦也容易想見。我決不想把處在這樣困苦境地的人民情緒和波昂外交政策的聲明混為一談。

近五十年來，英國自由主義的作家總以為一世紀以來歐洲的病根在德國，德國人過去具有以武力控制整個歐洲的使命。或有人認為，歐洲未來的和平要靠德法兩國能捐棄世仇的心理。現在大家可以看見，德國政府的全盤政策在謀歐洲的團結，尤其注意法德友誼的促進，並且真能見諸事實的表現。一部分英國人却對此表示憤慨，以為這是巴黎——波昂軸心，並且犧牲英國的利益。目前西方列強的外交歧見真能給蘇俄領袖無限快慰！

關於和蘇俄的外交談判也有好些不同看法。在去年巴黎高階層會議沒有決裂以前，有人對此寄以期望，包括英國首相麥米倫在內，他不僅是主張，並且是設法促成這次會議的有力人物。但也有人

認為和蘇聯談判，簡直等於向黑暗勢力投降，並且更有人說，蘇俄外交家狡猾異常，西方外交家總是會被愚弄的。和蘇俄領袖談判，如果真有問題，也未始不可以進行。但實際勢力衝突的強國要想交涉成功，必須能夠做到互讓，每一方面都有所表示。現在情形的困難就在西方好像容易有此想像，蘇俄政府開口，要求那個那個，他們却再沒有什麼能對蘇俄政府讓步了。

高階層會議在過去不僅為着談判，有時亦可當做宣傳。蘇俄領袖最能利用會議來作宣傳，目的是要選擇適當時機，使談判決裂，並使西方各國政府陷於最不利的地位，特別在西方選民與亞非知識份子心目中益顯其窘。為什麼祇有蘇俄政府能進行宣傳戰，這一點實在令人難解。我個人覺得西方的道德與政治立場並不比蘇俄差。可是西方政治家從來不曾設法提出來過。

自然赫魯曉夫的地位比較堅強一些。他的政府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在外交上幾乎不斷贏得勝利。赫魯曉夫不必着急，沒有人向他要求迅速效果。他不必考慮總統或議會選舉。他毋需憂慮他的盟國。大家總覺得蘇俄人民的安於現狀，完全由於秘密警察與恐怖政策所造成，自由社會在精神上比較健全。但我們不能過分注重這一點。誠然，警察與恐怖背後都存在。可是俄共之能有效的控制其人民，並使其人民忍受艱苦，從事生產，此中原因，除俄羅斯民族性外，亦不能忽視俄共之安撫政策，及其對科學與武力之炫耀。目前在蘇俄當政的人真的兼具列寧與尼古拉一世的觀念與精神，甚至加上一副偽裝的笑臉。這種「結合」需要民主陣容作一番深刻的檢討，并繼之以全面有效的行動。